

就业结构对政府债务的影响^{*}

——基于 OECD 国家数据的分析

李 猛

【摘 要】文章从就业结构转变的角度,对政府债务膨胀原因做出一个新解释。研究发现,在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的大趋势中,整个经济系统的支出扩张速度必然快于收入汲取速度。这一规律在私人部门的表现是经济盈余下降,有效需求萎缩;在公共部门的表现是机构难以精简,财政失衡加剧。从具体的影响程度上看,1970 年以来 OECD 国家服务业就业占比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将推动政府负债率增加 2 个百分点左右。面对就业结构转变所引致的政府债务膨胀问题,一是要消除或弱化劳动力转移的非市场性驱动因素。与 OECD 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结构转变不仅有共性,还有个性。个性在于,垄断行业工资增长比竞争性行业更快,诱使劳动者进一步“用脚投票”。二是要在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上做文章。根据 OECD 国家经验,制造业生产率越高,出现政府债务恶化的可能性越小。这意味着,加快“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可以部分地对冲就业结构转变所酿成的财政风险。

【关键词】就业结构 政府债务 服务业 OECD 国家

【作 者】李 猛 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历史性地攀升至 50.4%,首次擎起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的就业“压舱石”作用越发显现,其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增加到 42.4%,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高出 14.0%和 13.2%,甚至比国家“十二五”规划目标还高出 3.8%。《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就业占比在 1977 年突破 10%,1993 年突破 20%,2004 年突破 30%,2014 年突破 40%。可见,中国服务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正在加速增长。服务业就业占比从 10%增加到 20%历时 16 年;从 20%增加到 30%历时 11 年;从 30%增加到 40%历时 10 年。虽然中国与美国经济学家维克多·福克斯(Victor.Fuchs)在 1968 年提出的服务经济辨别标准——服务业就业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博弈行为及其规制研究”(编号:15CJL009)的阶段性成果。

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超过 50%,还有一些差距^①,但是,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经验看,中国完成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时间并不遥远。

毋庸置疑,就业结构的服务化是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表 1 显示,近几十年来,西方工

表 1 工业七国的就业结构和相对生产率

国 别	年 份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3
德国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0.48	0.45	0.43	0.41	0.40	0.36	0.34	0.30	0.29	0.28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0.45	0.48	0.52	0.54	0.56	0.61	0.64	0.68	0.70	0.71
相对生产率	1.39	1.38	1.35	1.52	1.51	1.41	1.49	1.67	1.83	1.95
法国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0.39	0.38	0.35	0.32	0.30	0.27	0.26	0.24	0.23	0.22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0.48	0.52	0.56	0.61	0.65	0.68	0.70	0.72	0.74	0.75
相对生产率	1.14	1.15	1.24	1.36	1.40	1.41	1.39	1.36	1.29	1.35
加拿大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0.31	0.29	0.29	0.25	0.25	0.23	0.23	0.22	0.20	0.20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0.61	0.65	0.66	0.70	0.71	0.73	0.74	0.75	0.78	0.78
相对生产率	1.49	1.71	1.84	1.96	1.68	2.00	2.19	2.05	1.75	1.76
美国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0.35	0.31	0.31	0.28	0.26	0.24	0.23	0.21	0.17	0.14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0.61	0.65	0.66	0.69	0.71	0.73	0.74	0.78	0.81	0.84
相对生产率	1.45	1.61	1.62	1.62	1.59	1.67	1.58	1.67	1.92	2.32
日本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0.36	0.36	0.36	0.35	0.35	0.34	0.32	0.30	0.27	0.27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0.47	0.51	0.54	0.56	0.58	0.60	0.63	0.66	0.70	0.69
相对生产率	2.09	1.84	1.71	1.72	1.80	1.41	1.36	1.60	2.03	2.12
意大利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0.40	0.39	0.37	0.33	0.32	0.34	0.32	0.31	0.29	0.27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0.41	0.45	0.49	0.56	0.59	0.60	0.63	0.65	0.68	0.69
相对生产率	1.45	1.44	1.44	1.53	1.48	1.32	1.31	1.26	1.20	1.54
英国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0.45	0.40	0.38	0.33	0.33	0.28	0.26	0.23	0.20	0.20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0.52	0.57	0.59	0.65	0.65	0.70	0.73	0.76	0.79	0.79
相对生产率	1.32	1.38	1.52	1.76	1.48	1.80	1.69	1.55	1.56	1.51

注:本文的相对生产率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http://data.un.org>)和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www.world bank.org>)。

① 实际上,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服务型经济的判断并无统一标准。一般认为,服务经济形成的主要标志是服务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即经济中从事服务活动的人员及其创造的增加值超过农业与工业之和,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 50%以上的比重(刘世锦等,2010)。

业七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从原来的“难分伯仲”演变成如今的“主次分明”,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现象一目了然。然而,就业结构在短期内的迅速变化,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尤其是公共部门的“入不敷出”问题将日益显现,一方面,劳动力从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向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①转移,将拉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进而削弱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收入汲取能力;另一方面,面对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劳动技能转换及失业等问题,政府势必增加有利于再就业的教育培训支出、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等,并增加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最终政府支出规模不断膨胀。关于这一点,日本就业服务化过程中出现的政府债务膨胀问题在工业七国中最为典型,也给了本文的上述猜想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图 1 显示,在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日本政府负债率迅速提高,服务业就业占比与政府负债率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正相关。

由是观之,全球公共部门的债务膨胀,与就业服务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关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业结构转变所引致的政府债务膨胀问题尚未引起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关注。迄今为止,关于政府债务膨胀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比较多地归结为以下几点:(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因此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2)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为了“救市”而祭出的反危机措施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3)民生支出刚性增长、公债利息支出扩大、国防开支及战争军费筹措等因素造成财政收支失衡;(4)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府天生具有“赤字倾向”,不同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的竞争会引发财政的“公共池塘”问题;(5)财政赤字的思想基础在变化,即政府财政赤字观从最初的“恪守财政平衡”,转变为后来的“可以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发展成接下来的“财政赤字不应常态化”,再到如今的“财政赤字不应超越警戒线”。不可否认,已有的这些关于政府债务膨胀原因的解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这些症结并不是近几十年才出现,但为什么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债务膨胀格外明显?可见,要将关于政府债务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必须紧扣特定的时代背景。具体而言,伴随两次工业革命,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加速”;而 20 世纪 7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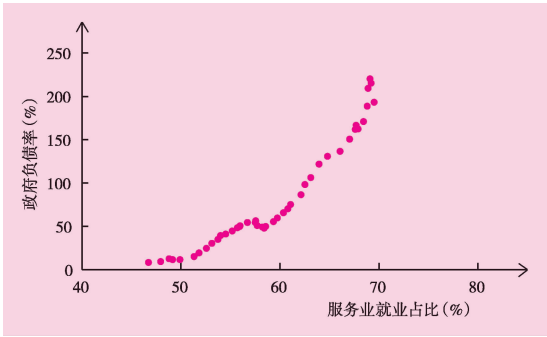


图 1 1970 年以来日本服务业就业占比与政府负债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en/data>)。

① 表 1 显示,工业七国的相对生产率均大于 1。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代以来,工业化国家日益走向城市化,劳动力又快速地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经济增长又出现了“结构性减速”^①。可以想象,“水落”的结果便是“石出”,一系列问题就凸显出来。总之,当前的时代特征已经不同以往,必须正视经济系统的结构性变化所酿成的新风险和新挑战。鉴于此,本文将从就业结构转变的角度,对政府债务膨胀原因做出一个新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借鉴了 Baumol 的研究,并对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正。Baumol (1967)提出了“成本病”理论,认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提高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且在建模时提出了四大假设:(1)经济系统分为技术进步部门和技术停滞部门,后者劳动生产率为零;(2)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3)不同部门的工资率相同;(4)工资增长速度与技术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同步。从经验上看,经济部门技术进步的速度有快有慢,不存在绝对的技术停滞部门,因此本研究放松了 Baumol (1967)的第一条假设,沿用其他三条假设。

二、基本模型

为了验证上述就业结构转变与政府债务膨胀之间关系的猜想,本研究在 Baumol (1967)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基本模型,分析就业结构转变所引致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债务膨胀问题。假定整个经济系统分为两大部门——高生产率部门和低生产率部门,其劳动力数量分别为 L_1 和 L_2 ,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e^{zt} 和 e^{ft} ,其中 $z > f$,产出数量分别为 Y_1 和 Y_2 ,单位产出成本分别为 C_1 和 C_2 ,单位产出税率分别为 r_1 和 r_2 ,工资率均为 We^{zt} ,其中 W 为常数。由此,两个部门产出 Y_1 和 Y_2 可以视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函数:

$$Y_{1t} = L_{1t} e^{zt} \quad (1)$$

$$Y_{2t} = L_{2t} e^{ft} \quad (2)$$

如果劳动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生产成本将是其所支付的工资。由此,高生产率部门和低生产率部门单位产出成本可以表述为:

$$C_{1t} = W \quad (3)$$

$$C_{2t} = W e^{(z-f)t} \quad (4)$$

进一步,低生产率部门单位产出相对于高生产率部门的成本等于:

$$\frac{C_{2t}}{C_{1t}} = e^{(z-f)t} \quad (5)$$

式(5)表明,当 t 趋于无穷大,低生产率部门单位产出的相对成本就会不断膨胀。实际上,式(5)的经济学含义非常丰富。可以试想,如果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来代替基本模型中出现的低生产率部门和高生产率部门,则公共部门产出的单位成本将随着私人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而稳步提高。如果分别用服务业和制造业来代替基本模型中的低生产率部门

① 袁富华(2012)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减速,与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密切相关,而生产率的减速是由于产业结构服务化这种系统性因素造成的。

和高生产率部门,服务业的单位产出成本会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而逐渐提高。

假定高生产率部门产出和低生产率部门产出的比值为 m 。在劳动供给总量保持稳定时(即 $L=L_1+L_2$),可以得出两部门各自劳动力占比的数学表达式,即:

$$\frac{L_{1t}}{L} = \frac{L}{me^{(z-f)t}+1} \quad (6)$$

$$\frac{L_{2t}}{L} = \frac{me^{(z-f)t}L}{me^{(z-f)t}+1} \quad (7)$$

式(6)和式(7)表明,当 t 趋于无穷大, L_1 将越来越小,而 L_2 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在劳动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劳动力不断从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到低生产率部门,是一种客观规律。同理,如果分别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来代替基本模型中的低生产率部门和高生产率部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就会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这也正是政府边界不断扩张、政府机构不断膨胀的一种答案。如果分别用服务业和制造业来代替基本模型中的低生产率部门和高生产率部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就会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这也正是全球经济出现服务化趋势的一个根源。如果将式(5)和式(6)、式(7)结合起来便会发现,本来公共部门的工资水平增速已经快于其劳动生产率增速,如今劳动力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叠加效应将导致公共支出进一步扩张;本来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增速已经快于其劳动生产率增速,如今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叠加效应将导致经济成本进一步扩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劳动力的流动,政府税收收入的来源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frac{r_2 Y_{2t}}{r_1 Y_{1t}} = \frac{r_2 L_{2t}}{r_1 L_{1t}} e^{(z-f)t} \quad (8)$$

可以看出,式(8)的值将不断增大。换句话说,政府税收来源中,由服务业带来的部分越来越重要。假定两部门的总产出为 Y ,总成本为 C 。那么,单位经济产出的平均成本可以视为低生产率部门劳动力所占比例与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额的函数,即:

$$\frac{C_t}{Y_t} = \frac{W}{1 - \frac{L_{2t}}{L} + \frac{L_{2t}}{L} e^{(f-z)t}} \quad (9)$$

在劳动供给总量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低生产率部门就业数量的增加对应着高生产率部门就业数量的减少,即 $\Delta L_1 + \Delta L_2 = 0$ 。由此,可以通过经济产出单位成本对 L_1 和 L_2 的偏导数,求出就业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单位产出成本相对变化量:

$$\left(\frac{C_t}{Y_t}\right)_{L_2} - \left(\frac{C_t}{Y_t}\right)_{L_1} = \frac{2WLe^{zt}(e^{-z}-e^{ft})}{Y_t^2} \quad (10)$$

式(10)的值恒大于零。这意味着,在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的大趋势中,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在不断地提高。

假定来源于两部门的总税收为 R ,那么,单位经济产出的平均税率也可以视为低生产率部门劳动力所占比例和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额的函数,即:

$$\frac{R_t}{Y_t} = r_1 + \frac{r_2 - r_1}{\frac{L - L_2}{L_2} e^{(z-f)t} + 1} \quad (11)$$

与式(10)的推导过程类似,可以求出就业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单位产出税率的相对变化量:

$$\left(\frac{R_t}{Y_t}\right)_{L_2} - \left(\frac{R_t}{Y_t}\right)_{L_1} = \frac{2Le^{zt}e^{ft}(r_2 - r_1)}{Y_t^2} \quad (12)$$

如果高生产率部门税率比低生产率部门税率更高,即 $r_1 > r_2$,那么,整个经济系统的税收总额将不断降低。如果高生产率部门税率比低生产率部门更低,即 $r_1 < r_2$,那么整个经济系统的税收总额将逐渐提高。

结合式(10)和式(12),可以得到公共部门收支缺口的表达形式:

$$\left[\left(\frac{R_t}{Y_t}\right)_{L_2} - \left(\frac{R_t}{Y_t}\right)_{L_1}\right] - \left[\left(\frac{C_t}{Y_t}\right)_{L_2} - \left(\frac{C_t}{Y_t}\right)_{L_1}\right] = \frac{2Le^{(z+f)t}[(r_2 - r_1) + W - We^{(z-f)t}]}{Y_t^2} \quad (13)$$

当 t 趋于无穷大,无论如何设定两部门的税率,式(13)的值恒大于零。也就是说,在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的大趋势中,整个经济系统的支出扩张速度必然快于收入汲取速度,经济盈余不断缩小,债务负担逐渐扩大。

三、方法和数据

在上述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以下的计量回归模型,来检验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过程的政府债务膨胀问题。

$$\ln debt_{it} = \beta_0 + \beta_1 \times \ln deindustrialization_{it} + \gamma \times \ln X_{it} + \eta_t + \xi_i + \varepsilon_{it} \quad (14)$$

其中,下标 t 和 i 分别代表第 t 个年份和第 i 个国家(地区), $debt_{it}$ 代表政府负债率, $deindustrialization_{it}$ 代表服务业就业占比, X_{it} 是控制变量, η_t 和 ξ_i 分别为年份哑变量和国家(地区)哑变量, β_0 是常数项, β_1 和 γ 是估计系数, ε_{it} 是随机扰动项。式(14)检验经济服务化对政府负债率的总体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基于式(10)和式(12),本文还分别考察了就业服务化对单位产出成本和单位产出税率的影响,计量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对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选择是更换解释变量:一是用服务业产出占比作为服务业就业占比的代理变量;二是将解释变量更换为滞后一期,同时,将控制变量也滞后一期。为了减轻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添加以下的控制变量:相对生产率、人口规模、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其中,选取相对生产率作为控制变量的依据前一部分的理论推导:式(13)表明,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影响了公共部门的收支缺口。人口规模、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这3个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了Alesina等(1998)、Henrekson(1993)、Cameron(1978)的研究。他们在研究政府支出规模膨胀时,分别强调了人口规模、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的作用。

为了增强实证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将计量数据样本从前述的西方工业七国,扩大到28个OECD国家。捷克、爱沙尼亚、以色列、卢森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6个OECD国家由于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没有被包含在本文的样本内。本文计量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70~2013年。表2给出了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政府负债率	1162	0.5111	0.0328	2.2030	0.4462	0.3295
单位产出成本	1108	0.3385	0.1186	0.5871	0.3380	0.1117
单位产出税率	1137	0.2738	0.0897	0.4924	0.2770	0.0918
服务业就业占比	1036	0.6038	0.2903	0.8120	0.6233	0.1130
服务业产出占比	1140	0.5840	0.2729	0.8108	0.6105	0.1283
相对生产率	1015	1.3901	0.6168	3.2365	1.3700	0.4004
人口规模(亿人)	1204	0.3929	0.0281	3.1886	0.1529	0.5344
发展水平(万美元)	1204	1.9725	0.0292	10.2832	1.4017	1.7244
开放程度	1204	0.6254	0.0910	2.0908	0.5677	0.3196

注: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单位产出成本(财政支出与GDP的比率)、单位产出税率(税收收入与GDP的比率)数据来自联合国《联合国年鉴》,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和《世界经济展望》,欧盟委员会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http://stats.oecd.org>),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统计数据表,以及相关国家政府网站。服务业就业占比、服务业产出占比、相对生产率、人口规模、发展水平(人均GDP)、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分析

表3给出了基本回归结果。其中,A、B、C列所反映的是就业结构与政府债务之间的总体关系,其被解释变量为政府负债率;D、E、F列从支出端展现了就业结构与政府债务之间的传导机制,其被解释变量为单位产出成本;G、H、I列从收入端展现了就业结构与政府债务之间的传导机制,其被解释变量为单位产出税率。表3中A、D、G列没有引入任何控制变量,B、E、H列引入了固定效应,C、F、I列除引入了固定效应外,还控制了相对生产率、人口规模、发展水平、开放程度。

从就业结构与政府债务的总体关系看,无论是否引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服务业就业占比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现象是一种普遍规律。从就业结构与政府债务的传导机制看,在分别引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服务业就业占比与政府负债率之间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与单位产出税率之间均呈现出显著负相关。换言之,在就业结构服务化的进程中,经济系统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汲取能力逐渐下降。

表4报告的是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3类似,A、B、C列依然反映总体关系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第D~I列则反映了传导机制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4所报告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分

为两类:一是用服务业产出占比作为服务业就业占比的代理变量,其结果反映在 A、B、D、E、G、H 列中;二是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结果做滞后一期处理,其结果反映在 C、F、I 列中。

表 3 基本回归结果

	政府负债率			单位产出成本			单位产出税率		
	A	B	C	D	E	F	G	H	I
服务业就业占比	2.088*** (9.322)	1.915*** (2.999)	2.228*** (5.881)	0.144* (1.792)	0.450*** (3.362)	1.788*** (6.853)	-0.218** (-1.995)	-0.381** (-2.513)	-0.393*** (-3.236)
相对生产率			-2.223*** (-8.334)			-0.221*** (-3.347)			0.228** (2.036)
人口规模			2.708*** (4.044)			0.569*** (3.382)			0.187*** (4.746)
发展水平			-0.148 (-0.648)			0.558*** (9.832)			-0.081* (-1.811)
开放程度			0.577** (2.209)			0.529*** (8.093)			0.443*** (3.479)
常数项	0.141*** (3.086)	0.009 (0.068)	-19.052*** (-3.513)	-0.841*** (-5.848)	-0.724*** (-9.218)	-2.762** (-2.034)	-0.673*** (-9.483)	-0.543 (-9.928)	-1.838 (-0.888)
样本量	1036	1036	1015	1036	1036	1015	1036	1036	1015
R ²	0.228	0.719	0.789	0.112	0.798	0.871	0.046	0.667	0.974

注: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1%的统计检验。除 A 列外,B~I 列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 4 稳健性检验

	政府负债率			单位产出成本			单位产出税率		
	A	B	C	D	E	F	G	H	I
服务业就业占比	2.366*** (4.490)	1.807** (2.063)	2.251*** (2.744)	0.276*** (3.501)	0.755*** (3.503)	0.802*** (3.723)	-1.408*** (-5.472)	-0.933*** (-3.531)	-0.493** (-1.972)
相对生产率		-1.525*** (-4.764)	-1.418*** (-4.746)		-0.312*** (-3.974)	-0.247** (-2.312)		0.387*** (3.278)	0.737* (1.781)
人口规模		0.078* (1.672)	0.191 (0.429)		0.215* (1.805)	-0.097 (-0.806)		0.027 (0.142)	0.092 (0.450)
发展水平		-0.205* (-1.834)	-0.231 (-0.998)		-0.578*** (-9.399)	-0.341*** (-8.705)		-0.049 (0.517)	-0.083 (-0.839)
开放程度		0.505* (1.811)	0.384* (1.755)		0.546*** (7.768)	0.542*** (7.565)		0.374*** (3.016)	0.436*** (3.357)
常数项	0.265** (2.222)	2.062 (0.497)	0.669 (0.171)	-0.762*** (-9.678)	3.232*** (3.089)	2.159** (2.047)	-0.346*** (-6.809)	-0.619 (-0.375)	-1.096 (-0.616)
样本量	1036	1015	987	1036	1015	987	1036	1015	987
R ²	0.547	0.763	0.785	0.595	0.851	0.858	0.665	0.976	0.974

注: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0%、5%、1%的统计检验。除 A 列外,B~I 列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A、B、D、E、G、H 列使用了服务业产出占比作为服务业就业占比的代理变量;C、F、I 列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做了滞后一期处理。

在稳健性检验中,无论是使用代理变量,还是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基本回归结果中所展现出来的服务业就业占比与政府负债率的总体关系和传导机制都没有发生改变。换句话说,就业结构转变导致了政府债务膨胀,这一结论是稳健的。结合前面的理论推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或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大趋势中,整个经济系统的支出扩张速度必然快于收入汲取速度。这一规律在私人部门的表现是经济盈余不断缩小;在公共部门的表现是债务规模逐渐扩大。从具体影响程度上看,基本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就业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政府负债率会相应地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

控制变量中能在基本回归和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显著性的变量只有开放程度和相对生产率。从开放程度看,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则财政汲取能力也越强,但由于单位产出成本也增加^①,财政收支相抵后的综合结果就是政府负担加重。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单位产出成本增加的速度快于单位产出税率。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开放程度的弹性系数上得到印证。表3和表4的计量结果共同显示,开放程度对单位产出成本的弹性系数在不同的方程下均显著低于单位产出税率。从相对生产率看,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则财政汲取能力越强,加之单位产出成本越低,从而政府负债率越低,出现债务恶化的可能性越小。由此可以推断,“一哄而上”地发展服务业将不利于政府债务的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发达经济体重新强调制造业的发展,以避免产业空心化问题。反观中国,目前多数地方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已处于持续的下降通道中,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在近期公布的各地“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对服务业占比提出明确要求的比比皆是,而对制造业占比提出明确要求的寥寥无几。

五、国际经验与中国的现实

上述国际经验,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就业结构转变与政府债务加重并存的现实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须审视就业结构与政府债务关系的理论推导和实践演绎。

从理论推导上看,基本模型的理论假设在中国是否成立?尤其是,中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是否也高于服务业,工业工资水平是否与服务业大致相当?图2显示,与前述的OECD国家类似,中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比值显著大于1,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表5给出了中国按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水平。从总体上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较为接近。从细分行业上看,制造业工资水平略低于社会平均,而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平均。从实践演绎上看,中国低生产率部门的成本是否比高生产率部门膨胀的

^① 单位产出成本提高的另一层含义是,政府规模将不断扩大。关于这一点,大量研究经济开放、全球化与政府规模之间关系的文献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Cameron(1978)和Rodrik(1998)的研究结论。

更快,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是否快于税收收入?表5显示,无论在私营单位还是在非私营单位,第二产业的工资增幅均低于社会平均,而第三产业的工资增幅总体上高于社会平均。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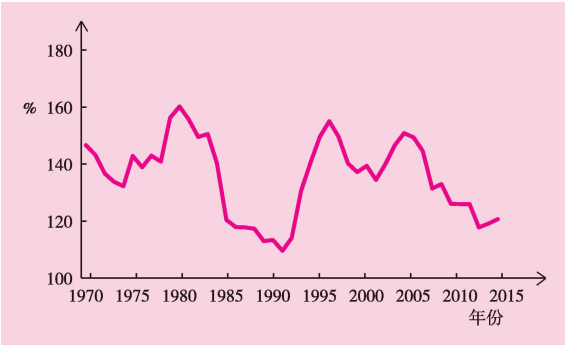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第二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比值的变化
注: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财政自给能力不断走低的趋势看(见图3),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总体上逊于财政支出,“入不敷出”问题非常明显。总而言之,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与OECD国家具有共性。

当然,中国与OECD国家的就业服务化相比,不仅有共性,还有着明显的个性。基本模型中所给定的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大前提,就是制造业生产率更高,以及部门间工资率趋同。实际上,驱使劳动力

在中国的产业间、部门间转移的,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因素。(1)垄断因素。表5展示了一些微妙的事实:在非私营单位,工资水平更高、增长的速度更快。一些行业,如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公用等的竞争性业务向社会资本开放的程度还远远不够,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互联网、商贸物流

表5 2015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增幅

	私营单位		非私营单位	
	平均工资 (元)	比上年增长 (%)	平均工资 (元)	比上年增长 (%)
各行业平均	39589	8.8	62029	10.1
农、林、牧、渔业	28869	7.5	31947	12.7
采矿业	38192	6.6	59404	-3.7
制造业	38948	8.2	55324	7.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4631	4.4	78886	7.6
建筑业	41710	7.4	48886	6.7
批发和零售业	36635	8.1	60328	8.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0495	4.1	68822	8.5
住宿和餐饮业	31889	8.2	40806	9.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7719	13.1	112042	11.1
金融业	44898	8.0	114777	6.0
房地产业	41767	10.4	60244	8.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3770	11.1	72489	8.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0441	6.3	89410	8.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7222	10.0	43528	11.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4778	13.7	44802	7.0
教育	34635	2.8	66592	17.7
卫生和社会工作	40558	9.0	71624	13.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4974	9.2	72764	13.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	—	62323	17.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等领域垄断性成分较高,吸引劳动者的能力更强。(2)政策因素。从资源配置方式上看,政府主要进行纵向干预,即根据纵向一体化安排生产组织体制,以政府的职能部门为主导纵向分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众所周知,在“二战”后的二三十年,“纵向”政府干预模式非常流行。但近年来,允许政府选择成功者或失败者,并因此造成政府被既得利益者俘获的范围不断增加这一点,受到了极大的批评(阿吉翁,2014)。“纵向”的政府干预模式,也在强化劳动者的产业间转移。总之,与 OECD 国家就业结构服务化的速度相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具备垄断背景的部门、得到政策扶持的部门在经济减速的大趋势中依然可以很好地生存,而经济减速的后果主要是由竞争性部门(主要是生产性中小企业)来消化,最终诱使劳动者进一步“用脚投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业,源源不断地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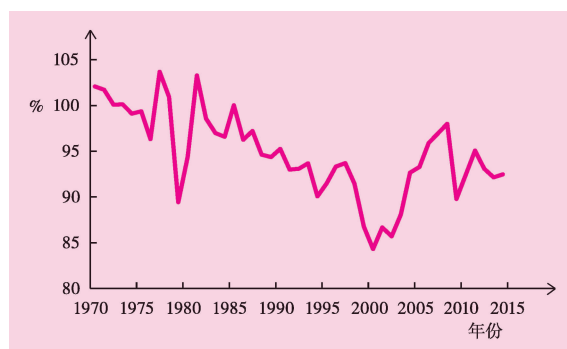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演变

注:财政自给能力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就业结构转变的角度,给出政府债务膨胀原因的一个新解释。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践演绎,本文发现,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是大势所趋。在劳动力从这些高生产率部门向那些低生产率部门转移的过程中,无论是私人部门,抑或公共部门,其支出扩张速度必然快于收入汲取速度。这一规律在私人部门的表现是经济盈余下降,有效需求萎缩;在公共部门的表现是机构难以精简,财政失衡加剧。由此,前面提及的几种各不相同的关于政府债务膨胀原因的主流解释便可以从逻辑上“串”联起来:就业结构的转变造成企业和居民的盈余缩水,进而企业资本储备下降、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因此乏力,为了迎合选民,政府一方面雇用更多的人,花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强化“赤字财政”的共识,修改财政规则,最终,公共部门的财政失衡问题越发严重,举债上的机会主义行为越发明显。1970年以来 OECD 国家的数据显示,服务业就业占比与政府负债率呈显著正相关。从具体影响程度上看,服务业就业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政府负债率相应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面对就业结构转变所引致的政府债务膨胀问题,本文建议:

第一,要消除或弱化劳动力转移的非市场性驱动因素。与 OECD 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结构转变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是中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服务业,而工资率水平与服务业大致相当;个性是垄断行业工资率增长比竞争性行业更快,诱使劳动者“用脚投票”,进一步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集中。(1)在市场准入层面,要解决民营企业有门可进的问题。当前,一些民营企业在国内投资时面临的障碍,还不是在发达国家出现的

“旋转门”、“弹簧门”、“玻璃门”,而是看不到“门”。为此,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推动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开放,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并“留住”劳动者。(2)在机构改革层面,要解决部分行业人力资本过度配置的问题。当前,中国制造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短缺,而部分服务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过剩。为此,要深化文、教、科、卫、体等事业单位的改革,将沉淀在其中的人力资本、研究成果、文化等科技创新要素释放出来,引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中,进而推动这些非生产性部门由“钱变纸”(即把财政资金转化为科研成果)向“纸变钱”(即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效益)转换。

第二,要在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上做文章。根据 OECD 国家的经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出现政府债务恶化的可能性越小。这意味着,加快“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可以部分对冲就业结构转变所酿成的财政风险。(1)在政府层面,要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前,积极引导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为辖区内的先进制造业的规模和比重划定“底线”,推动他们在先进制造业上进行比拼和生产率上展开竞赛,是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2)在企业层面,要重视互联网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如今,全球性的产能过剩,使得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撼动了传统工业时代的一个重要基础——信息不对称。换句话说,未来的制造型企业必须实现快速、小批量、定制化的生产。为此,必须利用互联网打破企业内部林立的信息孤岛,将设计、制造、采购、办公等系统连接起来,从部分的自动化和部分的信息化阶段,进入到完全的自动化和完全的信息化阶段,实现“万物互联”,进而做到智能生产。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阿吉翁(2014):《寻求竞争力——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比较》,第5期。
2. 刘世锦等(2010):《关于服务经济发展的若干认识》,《科学发展》,第8期。
3. 袁富华(2012):《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经济研究》,第3期。
4.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经济研究》,第12期。
5. Alesina A., Romain W. (1998), Openness, Country Size and Govern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69, (3):305-321.
6. Baumol W.J. (1967),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57, (3):415-426.
7. Cameron D. (1978),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2, (4):1243-1261.
8. Fuchs V. (1968), *The Service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 Henrekson M. (1993), Wagner's Law: A Spurious Relationship. *Public Finance*. Vol.48, (2):406-415.
10. Rodrik D. (1998),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6, (5):997-1032.

(责任编辑:朱 犁)